Importing Psychoanalysis to China:
The Function of 'Critical Pluralism' as a Container

Freud and Asia. Evolution and Change: Psychoanalysis in the Asian Context
Beijing, China
October 21-24, 2010

Lee Rather Ph.D.
Psychoanalytic Institute of Northern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USA

2504 Clay Street
San Francisco, CA 94115
USA
Tel: (415) 269-1314
e-mail: leerather@comcast.net

向中国输入精神分析：作为容器的批判性多元主义的功能

Lee Rather （美国）
翻译：徐勇

摘要

尽管佛洛伊德坚持精神分析没有特殊的“世界观”，但我们现在必须承认各种理论流派，不管强调驱力、自我、客体还是自体，都来自那些他们的临床工作不可避免地根植于他们各自文化的西欧、北美和南美的分析师。当精神分析开始了它跨文化的中国之旅，我们必须保持开放的头脑，考虑西方精神分析的“发现”那些方面是普遍性的，那些是文化相关的。由中国的分析师和接受分析者的工作而产生的不同的分析性范式、概念和经验，其可能性是令人兴奋的。

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可能性并鼓励对新的发现的开放态度，作者讨论了“批判性多元主义作为一种容器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分裂西方精神分析的机构性正统观念。在批判性多元主义框架内操作的分析师保持了对精神分析理论全景的内在逻辑和有用性的欣赏，而没有成为任何一种理论的教条。考虑到分析师

之间训练和理论上的差异的性质，本文对 Bion 的工作作为分析师的一种容器进行了讨论。分析性理论最好被看作是有用的模式，而不是科学的事实，在这个意义上，本文对其于批判性多元主义及精神分析向中国文化的输入的相关性进行了探讨。

在将注意转向方法之前，本文的第二部分对佛洛伊德对精神分析理论原则的描述进行了讨论。作者阐述了这样的观点，精神分析首要地是一种探索心灵的方法，其次才是一系列的来自于其方法的理论结论。记住这一点以及批判性多元主义，将会最大程度地使在不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力量中工作的中国分析师发展出创造性的新鲜的发现成为可能。

向中国输入精神分析：
批判性多元主义的案例

> It would be a valid observation to say that psycho-analysis cannot ‘contain’ the mental domain because it is not a ‘container’ but a ‘probe’…
> (Bion 1970, p.73)

将精神分析带到中国

IPA 中国大会对于我们来说是一场盛事，我们这些精神分析师很高兴能够向新人介绍和传授我们在这个领域的历史、理论和技术。在我们自己当地的研究所和分级培训项目上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做。但是这次大会是一个特殊而重大的场合，让我们跨越这么大的地域、语言、历史和文化界限把精神分析传递到中国。

我演讲的目的是推荐一些初步的思想，希望对中国的治疗师理解精神分析有用，以及对教师和督导指导培训有用。出于简化的考虑，我将使用术语*分析师*、*分析对象和精神分析*，我承认这意味着不理会精神分析和精神分析性治疗的有用的区分（见 *IJP*，2010 年 2 月关于这一主题的一系列文章)。我也希望将我的评论置于这样一个背景中：我承认对于中国文化我并不是专家，我的演讲仅是基于植根于人性的分析理论的文化预见性而得出的分析师的思考，也是基于在我们成立的历史上和培训候选人过程中出现的不幸的理论党派之争的思考（Kernberg, 1996)。

精神分析在西方的第一个世纪，我们看到了广泛的理论“学校”的发展，按照他们强调的相关驱力、自我、客体或自体而松散的被组织起来(Pine 1990)。当分析师在他们的临床工作中开始努力寻找

有用的思考方式，并思考在爱、工作和文明中的日常生活以及其不满中的潜意识过程的本质时，每一种理论集簇开始兴起(Freud, 1930)。 虽然 Freud 坚持精神分析并没有自己特别的“世界观” (Freud, 1933)，现在将精神分析带到中国，我们仍需要认识到绝大多数分析师是西方欧洲、北美和南美人，他们通过分析师和分析对象都是植根于他们各自文化的访谈得出了他们的理论。

当中国对精神分析感兴趣，我们必须考虑到在中国分析师和分析对象的工作中，不同的家庭结构、性别角色和自体-他人关系的概念可能导致新的范式、概念和体验。此外，我们必须知道语言本身就有显著的不同，这也可能对个体觉知和体验产生很大影响(Boroditksy 2001, 2009)。简而言之，实际上在临床要“重新评估”西方精神分析师的家庭概念的有用性和普遍适用性。

以此设置为背景，本文的精髓在于： 1） 鼓励分析师对新发现持一种开放的态度， 2） 鼓励一种批判性多元主义的精神，而不是正统观念，以及 3） 考虑到这样的观点：精神分析首先和最初是一个设置和过程，其次才是一系列的理论结论。我相信这样的全面的分析性的态度将赋予中国分析师最好的学习氛围，

让他们在自己的训练的基础上逐渐整合精神分析，而不是“预加工”的进口货。

避免精神分析的党派之争

将精神分析带到中国的过程更远的并发于当代精神分析的多元主义和由 Freud 及其追随者开始的关于精神分析与其它治疗的差异的长期辩论。1914 年 Freud 写了一篇文章概述精神分析运动的历史。Freud 的另一个目的是寻找什么是精神分析和什么不是精神分析的定义。我将引用一些话：

> 其它的加入到宣泄法中的新的因素是我的工作的结果，这些都转变为精神-分析，我可能特别的提到了压抑和阻抗的理论，对婴儿期性欲的认识以及把对梦的解析和探索作为了解潜意识的资源(Freud, 1914a, p. 15)。

因此可以说精神-分析的理论尝试去说明观察到的两个显著而意外的事实，每当我们在他（病人）的过去生活中尝试去追踪神经症症状的来源时，我们都会发现的移情和阻抗的事实。每一条调查路线只要认识到这两个事实并把它们作为出发点开始工作，都有权利称自己为精神-分析，虽然他们达到的结果可能跟我自己的不同。而任何人如果采纳了问题的其它方面却避开了这两个假设却坚持称他自己是精神分析的话，都难逃企图盗用精神分析所有权的指责。(Freud, 1914a, p. 16)

当 Freud 在写这些的时候，他的理论已经与 Stekel, Adler, 和 Jung 有了不同并导致了分裂。事实上， Hanns Sachs 在 30 年后透露了一小部分(Gay, 1988)： Freud 和他的追随者已经走的很远，并建立了一个秘密的“委员会”以保护 Freud 所孕育的精神分析理论的基本教义，就是压抑的存在、潜意识、婴儿期性欲、揭示它们会遇到阻抗，在梦和移情中会发现它们的衍生物。在 1913 年，Freud 给了每一个成员(Jones, Ferenczi, Rank, Eitington, Abraham, 以及后来的 Sachs)一个刻有他自己收藏的古老雕刻的金戒指，以庆祝委员会的成立。

在同一时期Freud写了一系列关于技术的论文，阐述建立分析设置和过程(1911，1912a，1912b，1913，1914a，1914b，1915)。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从上面的引文中，Freud更多是通过*发现*而不是*发现的方法*来定义精神分析的。这与哲学和科学的方法是相反的，在哲学和科学中，定义的特征被认为是它的方法（即检验假设，看看他们是否可以被伪造），而不是它的发现(Popper，1959)。但是，尽管科学已经取得了检验命题的方法，作为一个群体，精神分析师们发现他们难以建立工具来评价对比命题和理论的有效性。部分结果就是精神分析常常因为其不“科学”而被批评(例如Grünbaum，1984)。

实际上，精神分析的谈话已趋向劝说，争论，和群体认同的政见。精神分析的历史由于理论变化而具有特征性，当其处在最佳状态时导致了辩论和发展(见Blass，2010因为一个精彩的讨论)；当其在最坏状态时导致了党派之争的沙文主义和随便的轻蔑：“那不是真正的精神分析”。

已故的Steve Mitchell详述了一个标志性的故事：一个非常有名新派精神分析师每次在传统的研究所讲演时就在桌子上放一把枪。每次都有人问道枪的事情，他就会很高兴地说这是用来对付第一个不问他

的观点的来源而问他的观点是否“真正的精神分析”的人的。(1995, p. xxiii).

回顾过去，可能有一段时间我们可以清楚的说出什么是“真正的精神分析”并保持一致，但是将当代的精神分析理论和技术传递到中国意味着输入广泛的、有时是混乱的理论全景，并从中形成一个人的分析性认同。最简单的概述一下可能包括：驱力结构理论、自我心理学、克莱因和中学客体关系理论、比昂的工作、拉康对弗洛伊德的解读、自体心理学和进化出来的人际心理学、主体间心理学以及关系的视角。一个精神分析的学生如何理解这些不同和经常冲突的精神分析模型？ 这种选择,像 Pine (1990)指出的那样，你可以选择正统教义、折衷主义或者选择性整合。正统教义虽然可以提供一种纯粹的认同和确定感，但必定会导致对其它的观点很盲目。折衷主义虽然以实用主义（“管用就行”）的名义避免了纯粹的独断，但缺少严格的理论。选择性整合在我看来是最佳目标，它提供了一个有吸引力的理想模型，既不纯粹也不折衷，但是是一条真正的理论整合之路，很明显对每一个分析师都是一个重大挑战。

批评多元主义：比昂理论的观点

精神分析理论和技术的选择性整合要求我们将自己沉浸到不同的方法中，随着时间推移将它们都应用到临床工作的大熔炉中，进行概念化的工作将他们

糅合起来(如果可能的话)，逐渐进展不断的进化出“个人的”模式。最好是由一个有良好氛围的培训机构进行培养，在那里可以提供一些支持和维持“批评多元文化”感觉的课程、讲课和督导。Strenger (1997) 对于最后一个术语（批评多元文化）提供了一个非常可行的定义：

> 批评多元文化的基本假设是，人类的认识在本质上是有限的；没有任何一个概念框架可以捕捉现实的、人类的或其它方面的所有可能，因此竞争性概念框架的共存本身具有极大的价值...我听到的批评多元文化的声音是理智的声音。它试图避免狂热主义和相对主义双方尖锐的性质，并尝试努力去维持倾听的能力，并欣赏其它可选择事物的内在逻辑。 (Strenger, 1997, p.127-128)

对于分析师教师和候选人来说，在这个目标的指引下在中国建立精神分析培训时，理论的确定性必须让路给批判性思维。此外，由于精神分析认识论中棘手的问题，确定性和批判性思维中必须允许一定程度的“无知”，这是一种接受可能性的精神状态，比昂引用诗人 John Keats 的一封信中的词语将其称为

“消极的能力”，他建议这是精神分析必不可少的一种状态。

> 我指的是消极的能力。就是一个人能处于不确定、神秘、疑惑中，却不急躁的谋求真相和理由。（Keats 引用比昂，1970，p.125）

比昂精神分析理论中的‘meta-view’作为“知识”和精神分析作为一门学科是值得在这里讨论的。比昂在分析的理论中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他关注的不只是分析对象的成长进化，而且也关心作为一个群体的精神分析师的心理成长的问题，因为他们试图把握临床过程，并产生心灵的模型。换种说法，比昂暗中提供的不仅是关于心灵的精神分析理论，也提供了精神分析师尝试达到这种理论的理论。通过被克莱因分析以及创造性地延伸她的概念（例如投射认同和 PS <>D），比昂的工作与克莱因学校密切相关。然而，在我阅读中，他所发展的脚手架概念的涵义远远超出了克莱因，并完全符合批评多元文化的分析性的态度。为了阐述这一观点，概述他的工作的一些突出方面是很有帮助的。

比昂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建议，那就是分析师要“没有记忆和欲望”的开始行动(1970)。在这样做时，他扩展了弗洛伊德关于为了“均匀悬垂的注意”而搁置“治疗师的野心”的建议并将其操作化(Freud, 1912)。为什么比昂建议分析师不要急于达到确定性？“消极的能力”在精神分析的什么地方，以及它是如何对分析师在复杂的批判性多元文化中发现一个锚定点起作用的？

比昂的重点并不是弗洛伊德的驱力和结构假说，也不是克莱因追查的无意识幻想地理学，而是从经验中学习时遇到的困难。他认为积极的精神成长是一个终身的过程，包括从对自己的现实认识不清转化为知道那些被修通和在曾经的抽象水平上被处理了的方面，同时与他们的情感根源保持联系。在他看来，我们是注定要在设备不足的情况下寻找真理，尤其是因为我们自己对真理的恐惧和对我们自己的漠视。总之，弗洛伊德和克莱因更关注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比昂则感兴趣于“知道”本身的过程。

Bion (1962a)在他最早的理论形成中，开始转变“思考”产生“思想”的观念，而是认为“思想”本身就是存在的，但是需要“思考”的过程来让其发展(Meltzer, 1978, p. 38). 他这是什么意思？在 Bion

的术语中，思想就是婴儿期挫折的记录。在他后来的模型中，他用 ‘O’这个象征符号表示绝对的但是未知的现实，‘O’给儿童压力并被记录为未经加工的体验或“beta 元素”。这些 beta 元素需要被忍耐、象征化并处理为精神可以利用的东西。如果这个过程没有达到，它们就变成“不可名状的恐惧”的来源，只能被排泄给他人和身体或者进入幻觉性精神病中。当进展顺利时，Bion 应用术语“空想 reverie” 母亲的这种接纳的状态，她可以接受投射、与婴儿的未加工的 beta 体验沟通并将其转化为我们所说的‘alpha’ 元素。这些可以再次以一种更相容的方式被婴儿摄入。这种 alpha 功能的过程就是 Bion 命名为“容器和被容纳”的重要关系(1962b)。通过逐渐的内化这个重复的过程，成长中的儿童开始发展出他自己的 alpha 功能，形成了一个内在的容器的感觉，而这成为了忍受痛苦和教化情绪体验的容器。事实上，每一个母亲都有她自己的心理学上隐含的局限性，对于她们每个人来说，发展空想的能力、容器功能和 alpha 功能都是很必须的。

成长的第二次决定性的机会就在精神分析中，病人可以逐渐的内化分析师的能力。当进展良好时，分析师能够包容那些病人不能忍受的事情，并逐渐的通过忍耐、消化和解析让这些东西变得可用。分析师的解析常常是变化的，这不仅由于他们特殊的内容，也由于他们

代表和提供了一个内化分析师提供的空想、容器和alpha 功能的机会。

同样的，与我们的批评多元主义的主体最相关的就是 alpha 功能和容器功能不仅适用于个体的发展，也有针对分析师个人和集体发展的功能。临床情境中在我们尝试理解和叙述时， ‘O’ 不断的给我们施加压力：1）我们认为在分析对象的精神中发生了什么 2）我们认为在我们共同创造的主体间精神中发生了什么，以及 3）在我们尝试维持分析功能时我们的精神中发生了什么。然而，由于心理不能直接通过感觉感知，必须通过分析师的 alpha 功能过滤，作为分析师我们一直*更多的在构建主观的模型而不是发现客观的模型*。带着这种感受性工作， Bion 认为精神分析师的独特的不寻常的性质就是规律其中的一条：

> 批评精神分析的一部分工作的基础是“不科学的”，就像批评它“不是宗教的”或者“不是艺术的”一样荒谬。精神分析并不是如此。(Bion, 1970, p. 62)

Alpha 功能和容器的功能都在持续进化。Bion 形成了他的网格结构 (1963)以图解思考和容器的进化功能以及他们是以何种方式接近或者离开心理学真理。在*精神分析的元素*(1963)中详尽的讨论的网格的灵感可能来自于元素周期表。Bion 设想其可以作为一个工具过滤精神分析会谈外部的反射，并在表格中进行比较而不是得到一些音乐碎片。许多 Bion 的读者发现比昂理论是一个笨重而棘手的工具， Meltzer 曾说过这是一个“光荣的失败”(1978, p. 70)。而我认为它对描述精神分析理论目前的发展很有用。

网格的纵轴是按如下来移动的： Beta 元素> Alpha 元素 > 梦中的想法 & 神话 > 预见 >观念 > 概念 > 科学的推论系统以及> 代数计算。横轴代表用何种方法思考记忆、注意、好奇心和行为。然而， Bion 放置了一个支点 (柱 2) ，在那里所有的元素都必须受现实原则的严酷考验。根据其中包含的不同水平的挫折，思考可能会或者不会混淆真理。争斗在这里进行，一边是全能感和确定感，另一边是不确定感和谦卑。 比昂的模型隐含的观念是：分析师作为一个群体常常倾向于打一场确定性的宗教战役而不是忍耐我们理论中固有的不确定性。精神分析理论当其目标是追求科学推理 状态时，就接近神话和观念了。就像 Bion (1962b, 1963, 1965, 1970)已经强调的，精神分析观念和理论在这一

点上最好被看做是一个有用的模型而不是科学的真实。纯粹主义、原教旨主义或者派系的确定性对于精神分析具有特征性，在混战中可以被看做对于在我们的原则中忍受不确定性的困难的情感反应。我的信念是一个批评多元主义的态度在中国精神分析的教育、培训和机构生活中可以提供一个结构性的容器，以忍耐很大程度的不确定和谦卑，并维持对新发现的创造性的开放态度。

精神分析作为一个探针：设置和进程

如果我们考虑 当代精神分析理论作为可行的模型而不是真理的适用范围，那有可能它们每一个单独可以涵盖精神生活的一些重要维度，但没有一个能够涵盖全部复杂的精神生活。这也让我们从正统的纯粹主义的确定性转移到更多不确定但是谦逊的批评多元主义的态势上来。这种观点把我们带回了我开始时引用的比昂的话，精神分析首先和最初是一个设置和过程，其次才是一系列的理论结论。

> 这将是一个有效的观察，我们可以说精神-分析不是“容纳”精神领域，因为其不是“容器”而是“探针”…(Bion, 1970, p. 73).

我也想要引用Meltzer在他的关于精神分析发展从弗洛伊德、通过克莱因到比昂的广泛的研究快要结束时的话：

> 也许我们这么说不会显得太乐观：比昂的工作在以指数的级别扩散以至于克莱因的工作会在我们回顾历史时看到。这种弗洛伊德工作到第三势力的进化，可以说使精神-分析从一个狭隘的关于神经症和性变态的理论，并具有想解释所有的事情的自负的野心，成长为一个足够调查和描述所有事但却解释不了任何事的科学的方法。
> (Meltzer, 1978, p. 118)

这种“调查探针”的最佳功能的情况开始于一个设置，包括咨询室、沙发、一致的时间表、费用以及适当的专业和伦理界限(Freud 1913, p. 125)。作为设置的一部分，分析师和分析对象已经至少是有意识的同意了一个方法。最常见的，这种分析对象的尝试包括自由联想，例如尝试自由的诉说，尽可能的自然，没有监察也不坚持那些文明的常规例如礼貌、得体的语言或者逻辑、目的指向的交谈..

分析师需要致力于去除对治疗的野心(Freud, 1912, p. 115)并尝试用均匀悬垂的注意来倾听：“使用这样一个定式：他必须把他的潜意识当做接受病人传送的信息的接受器官”（1912, p. 111)。用以解析的信息的主要来源是梦、自由联想、矛盾行为、重复（见诸行动）、移情和反移情。分析师将带着识别阻抗、防御和无意识衍生物，包容及表述这些秘密的目的进行倾听，并决定何时、以何种方式解析病人的动力学才何时。分析师将尝试在相对中立和一定程度的匿名的情况下实现分析功能，这些也是分析师可以最接近理想的地方。

这就是或多或少被国际精神分析协会接受和分享的模式，虽然也不同的学校之间、不同的分析师之间存在一些不同的方面。这种基本的模式被公认为一个理想的模式，可以为每一位分析师提供量体裁衣式的服务，对某些分析对象来说，提供重要的修正或“参数”可能是必要的(Eissler, 1953）。

弗洛伊德无可辩驳的天才之处就是他创造了这个设置。就像Winnicott (1954) 提到的，弗洛伊德真正创造了一个设置，这个设置本身就导致了情境、目的和超过了他自己所能想象的价值。弗洛伊德通过那些一直出于俄狄浦斯期的分析对象发展起了他的精神分析的初级版本。克莱因使用分析情境来治疗那些整个人都处于爱恨混合一体的分析对象。温尼柯特开创了应用设置与出于克莱因和弗洛伊德的发展任务之前，需要建立基本自体的病人工作的方式。我认为比昂很长远的想象了设置和过程作为一个有关存在的领域，在此患者增加了对现实“0”的忍耐力，包括对不确定感、无意义、孤独、脆弱和最终的死亡的忍耐力 (Yalom, 1980)。这让我想起这些对设置的各种各样的使用和进程并不是限定于不同种类的分析对象的，而是与每一个分析对象出于治疗的不同时刻和阶段等心理学发展的不同水平有关。熟悉当代多元文化下不同的理论术语可以让我们更流畅的跟分析对象谈论精神生活的不同水平。

精神分析和跨文化旅程

为了总结将精神分析带到中国的反应，我的目标是鼓励一种分析的态度和教育的精神，那就是包含当代的精神分析多元文化在内的全部理论领域保持开放。我更进一步说明了一个感想，那就是精神分析是探索心灵深处的第一个和最前沿的方法，第二位的是根据上述探索产生的身体模型。我已经讨论了这种分析的姿态不仅将导致我们探索已知的我们想什么的问题，也将有可能通过与其起源不同的文化中使用“精神分析探针”而产生新的概念，尤其是理论模型。

对于所有的分析对象来说，精神分析的过程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方式接近一个人。Rather (2001) 在一个“跨文化的旅程”中比较了它。

> 进入精神分析，分析对象就被邀请进入了一个跨文化的旅程。在他的“源文化”中，对以问题解决为目标的理性的线性思维被赋予很高的价值。通过变成一个分析对象，他进入了另外一个观点占上风的世界。在这里，必不可少的当地习惯和价值观很尊重各种显著的不随意现象，包括梦、矛盾行为、障碍相关链接、思维代沟、思维中

断、俏皮话、双关语、沉默、自发 躯体和感官的感觉、非言语法则以及其它。(Rather, 2001, p. 517)

由于这种现象出现的自发性和无意性，他们被他人的品质所影响，就好像他们从内部散发出一个外人，我们用术语称之为“无意识的他者”。当分析对象在治疗中，当分析候选人在培训中，以及当分析师将精神分析带到中国，我们都呼唤与这个无意识的他者的互助合作。这是“精神分析对人格的功能”的基础(Bion, 1962a)，就是感知和应用心灵现实以达到情感成长的目的。这种能力在西方非常强大，所以我们尤其感兴趣于看到这种合作，事实上是精神分析的整个过程将通过何种方式而受到文化差异的影响。

References

Bion WR (1962a). A theory of thinking. *Int J Psychoanal* **43**: 306-310.

Bion WR (1962b). *Learning from experience*. In *Seven Servants*. New York: Jason Aronson (1977).

Bion WR (1963). *Elements of psychoanalysis*. In *Seven servants*. New York: Jason Aronson (1977).

Bion WR (1965). *Transformations*. In *Seven servants*. New York: Jason Aronson (1977).

Bion WR (1970). *Attention and interpretation*. In *Seven servants*. New York: Jason Aronson (1977).

Blass RB (2010). Affirming 'That' s not psychoanalysis!' On the value of the politically incorrect act of attempting to define the limits of our fiel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91**, 81-99.

Boroditsky, L. (2009). How does our language shape the way we think? In Brockman (Ed.) *What's Next? Dispatches on the Future of Science, pp. 116-129.* New York: Vintage Press.

Boroditsky, L. (2001). Does language shape thought? English and Mandarin speakers' conceptions of time. *Cognitive Psychology*, **43**(1), 1-22

Eissler, K. (1953) . The effect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ego on psychoanalytic techniqu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 **1**, 104-143.

Freud S (1911). The handling of dream interpretation in psychoanalysis. SE **12**, 89-96

Freud S (1912a). Recommendations to Physicians Practicing Psychoanalysis. SE **12**, 109-120.

Freud S (1912b). The dynamics of the transference. SE **12**, 97-108.

Freud S (1913). On beginning the treatment. SE **12**, 121-144.

Freud S (1914a). On the history of the psychoanalytic movement. SE **14**, 1-66.

Freud S (1914b). Remembering, repeating, and working-through. SE **12**, 145-156.

Freud S (1915). Observations on transference-love. SE **12**, 157-171.

Freud S (1930).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SE **21**: 57-146.

Freud S (1933). New Introductory Lectures. SE **22**.

Gay, P. (1988). *Freud:A life for our time*. New York: Norton

Grünbaum A (1984). *The foundations of psychoanalysis: 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Jones, E. (1955). The life and work of Sigmund Freud: (Vol 2) Years of maturity 1901-1919. New York: Basic Books.

Kernberg OF (1996). Thirty methods to destroy the creativity of psychoanalytic candidates. *Int J Psychoanal,* **77**: 1031-1040.

Meltzer, D. (1978). *The Kleinian development. Part III.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work of Bion.* London: Clunie Press.

Mitchell SA & Black, MJ (1995). *Freud and beyond: A history of modern psychoanalytic thought.* New York: Basic Books.

Pine F (1990) *Drive, ego, object, & self*. New York: Basic Books.

Popper K (1959)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London: Hutchinson. (translation of *Logik der Forschung* 1935).

Rather L (2001). Collaborating with the unconscious other: The analysand's capacity for creative thinking. *Int J Psychoanal,* **82**: 517-532.

Strenger, C. (1997). Hedgehogs, foxes, and critical pluralism: The clinician's yearning for unified conceptions. Psychoanalysis and Contemporary Thought, 20, 111-145.

Winnicott, D.W. (1954). Metapsychological and clinical aspects of regression within the psycho-analytical set-up. In Through Paedeatrics to Psychoanalysis. 278-294. (1975) New York: Basic Books.

Yalom I (1980). *Existential Psychotherapy*. New York: Basic Books.